

中国传统文化精要

张义明 编

西北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传统文化精要 / 张义明编 / 西安市:

西北大学出版社, 2011.8

ISBN 978-7-5604-2955-7

【原书定价】26.00

【中图法分类号】K203 (历史、地理>中国史>通史>文化史)

【内容提要】《中国传统文化精要》旨在较为全面地展现和诠释中华民族悠久灿烂的传统文化精华、充分体现中华民族的精神风貌、客观反映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现象,力求简洁地从社会生活的各个角度和不同方面来阐释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内容,诠释中国传统文化的丰富内涵。本教材从中国传统文化的开端着笔,就中国古代哲学、史学、文学、伦理道德、宗教、教育、艺术、节日风俗、服饰、饮食、建筑、科学技术等几个主要方面来展示中华民族悠久灿烂的传...

【参考文献格式】张义明编. 中国传统文化精要.
西安市: 西北大学出版社, 2011.08.

加强中国传统文化教育 推进高等教育文化传承创新(代序言)

方光华

文化是一个民族或一个地区的群体的生活方式,包括语言文字、规章制度、组织形式、风俗习惯、价值观念、思维方式、道德情操、审美情趣、民族性格等,它是不断变化的复杂有机系统。

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总合,是物质和精神财富的积累。每一个国家、民族的文化,都有它发展的历史,都有它的昨天、今天和明天。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智慧、思想、情感和历史的真实写照,是中华民族延续发展的基础。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们对于传统文化的态度发生了显著变化,开始认识到传统文化不是我们的包袱,而是我们思想和智慧的重要源泉。关于中国传统文化与大学生教育的联系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

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有一些学者意识到传统文化是当代大学生道德和理性力量的深厚源泉。当时,在张岂之先生领导下,西北大学在大学生中开设“可爱的祖国”的系列讲座,并在1993年组织撰写《中国传统文化》一书,系统介绍中国哲学、道德、宗教、文物、教育、书法、绘画、医药与养生、饮食,建筑各方面的基本知识,并将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概括为“人文”精神、“自然”精神、“对偶”精神、“会通”精神。

大学生中的中国传统文化教育,随着大学文化素质教育理念的出现得到推进。1995年11月,时任教育部副部长的周远清发表《加强文化素质教育,提高高等教育质量》,提出我国高等教育要加强文化素质教育,并对文化素质教育的内容做了这样的表述:“主要是文、史、哲的基本知识;艺术的基本修养;当代我国和世界优秀文化成果三个方面。当然,对文科的学生需要加强自然科学的教育”。文化素质教育抓住了当时我国高等教育面对的两个突出问题,一是要加强和改进人文教育,二是要促进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的融合。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明确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任务,就是全面推进素质教育,“普遍提高大学生的人文素养和科学素养”。在这个背景下,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在全国各主要大学被迅速推广,中国传统文化与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的联系也得到了更加清晰的论述。大家认识到:文化素质是知识与能力的总汇,与民族传统文化

是有联系的。传统文化的价值观、道德观和行为准则可以为当代大学生确定人生信念提供参考,传统文化精神上追求“天人合一”,政治上崇尚“礼乐教化”,文化上主张“和而不同”,可以为大学生判断世界文明的发展方向提供参照。青少年和大学生学习了解一些优秀传统文化知识,他们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将会更加强烈,他们的现代性眼光将会更加深邃。对于如何在大学生和青少年中进行祖国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也形成了许多深刻的见地。例如,传统文化教育必须服从文化发展的内在规律,必须立足于与现代化的深刻联系;传统文化教育教材要善于处理文化精神与文化内涵的关系,既要有对传统文化所包含的主要理论命题深入浅出的分析,又要有对传统文化各个方面的全面介绍,同时文字要写得平易亲切,准确生动;传统文化教育需要调动学生参与的积极性,要加强扩充性教学资源建设,等等。

大学生中的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将随着对高等教育功能认识的升华而得到进一步的升华。最近,胡锦涛同志在庆祝清华建校 1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国高等教育要实现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和文化传承创新质量的全面提升。在论述“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必须大力推进文化传承创新”时,他说:“作为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和思想文化创新的重要源泉,大学要大力推进文化传承创新。这是高等教育思想和大学职能的新发展,是新时期我国高等教育与时俱进极其重要的新任务。”大学的传承和创新文化功能与生俱来,影响深远。而要发挥好这一功能,需要高校更加积极地发挥文化育人作用,需要高校更加积极地参与先进文化建设,始终辐射、影响、引领社会文化的更新和发展,需要高校更加积极开展对外文化交流,增进对国外文化发展趋势和最新成果的了解,增强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可以预见,在大学生中的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将迎来崭新的局面,我国高等教育之人文教育的道德自觉、理性自觉和文化自觉的境界将得到进一步提升。

以陕西理工学院党委书记张义明教授为首的教学科研团队,多年来致力于中国传统文化教育,他们合作完成的《中国传统文化精要》一书,系统梳理、总结和展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昨天”,同时,对中国传统文化中许多与整个人类社会发展方向一致的经典内容以及传统文化中包含的完整、和谐、智慧,进行了富有魅力的论述。我为他们的新著《中国传统文化精要》即将出版而感到由衷的高兴。我相信,这本《中国传统文化精要》将受到在校师生和广大读者朋友们的欢迎。

2011 年 5 月 15 日

(方光华,现任西北大学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目 录

导 论

- 一、文化的基本概念
- 二、中国传统文化的生成及特征
- 三、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的意义和方法

第一章 中国文化的开端

- 一、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炎帝和黄帝
- 二、中国古代农业、工具及手工艺
- 三、中国汉字的发明
- 四、龙的传人——中国文化精神的象征

第二章 中国古代哲学

- 一、中国古代哲学探讨的主要问题
- 二、中国古代哲学影响下的传统文化

第三章 中国传统史学

- 一、中国传统史学溯源和发展
- 二、中国古代传统史学的辉煌成就

第四章 中国古代文学

- 一、中国古代文学的辉煌成就
- 二、中国古代文学的文化特征

第五章 中国传统伦理道德

- 一、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发展
- 二、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 三、传统美德的继承和弘扬

第六章 中国古代宗教

- 一、中国的远古宗教
- 二、中国古代的主要宗教
- 三、中国古代宗教的总体本质

第七章 中国古代教育

- 一、中国古代教育的起源与发展

二、中国古代教育的重要成就

第八章 中国传统艺术

一、中国书法艺术

二、中国绘画艺术

三、中国戏曲艺术

第九章 中国传统节日及风俗

一、中国传统节日的由来和文化内涵

二、中国汉族主要传统节日和文化

三、中国少数民族主要传统节日和文化

四、中国其他传统节日

第十章 中国服饰、饮食文化

一、中国服饰文化

二、中国饮食文化

三、中国茶文化

四、中国酒文化

第十一章 中国古代建筑文化

一、中国古建筑的起源与发展

二、中国古代建筑的特点

第十二章 中国古代科学技术

一、中国古代科技成就

二、中国传统科学文化的价值

后 记

导 论

我们伟大的祖国以其悠久的历史 and 灿烂的文化而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她地域辽阔,物产丰盈。勤劳智慧的华夏儿女用勤劳的双手在漫长的人类发展史上创造并书写着人类的文明与进步,给我们留下了极其丰富的文化遗产。这些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不仅真实记录了我们这个伟大民族的历史发展进程,而且向世界展示着她昔日伟大文明的灿烂和辉煌;不仅影响着我们的过去和现在,而且还将对我们的未来产生深刻的影响,对世界文化的发展也将起到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

纵观世界现代化的历程,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不仅与经济革命、政治革命密切相关,而且与文化革命紧密联系。思想观念和科学技术的革命,常常是社会现代化的先导,并成为推动社会现代化的巨大动力。随着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科技转化为现实生产力速度不断加快,文化在现代化过程中的作用越来越大。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和谐发展和可持续发展,是现代化建设与社会振兴的统一,又是世界性与民族性的统一,既要汲取世界文化的先进成果,又要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包括价值观念、思维方式、伦理道德、科学技术、教育、文艺等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化体系的建立,既是中国现代化的一个重要内容,又是中国现代化的强大动力。

因此,作为中国人,作为中国现代化建设的物质承担者和民族文化继承者、创造者的中坚力量——广大青年学生,了解、学习、研究并继承我国的传统文化,不仅有助于增强我们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而且有助于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充分而必要的人文素质基础。学习中国传统文化,一方面,有助于我们辨别良莠,抛弃封建糟粕,继承优秀文化传统,建构具有现代意识的新文化;另一方面,有助于我们更准确地认清当前中国的国情,在科学发展观思想下更好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一、文化的基本概念

1. 文化

对文化概念的界定,是个复杂的问题。到目前为止,国内外仍无公认的统一定

论。我们要讨论“中国传统文化”，必须先从“文化”的基本概念入手，这是无法绕过去的“坎”，必须予以准确界定。而要界定“文化”一词，又须从认识“文”“化”两字开始。文，在甲骨文中写作纹理交错的形状，《说文解字》解释为“文，错划也，象交文”。由此衍生，又有文字、文章、条文、条理、装饰等意义。化，在甲骨文中写作一正一倒的两人之形状，指人的姿态的变动。由此衍生，又有变化、感化、教化等意义，因此，《说文解字》将其解释为“教行也”。“文化”一词，盖源于《易经》：“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西汉刘向的《说苑·指武》：“圣人之治天下也，先文德而后武力。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这里的“文化”，是指与“武力”相对的教化。其内容有两个方面：一是《诗》《书》《礼》《乐》；二是礼仪风俗。由此可见，在中国古代，文化就是文治教化、礼乐典章制度。今天我们通常用的“文化”一词，是19世纪末通过日文转译引进的。这个词在英文和法文中为 culture，德文为 Kultur，它们都是从拉丁文 Cultura 演化来的。拉丁文 Cultura 有耕种、居住、练习、留心、敬神等意思，现在的英、法、德等西方语种中都保留了拉丁文的某些含义。

19世纪中叶，一些新的人文学科如人类学、社会学和民族学等在西方兴起，文化的概念也随之发生变化，开始具有现代意义，成为这些新兴学科的重要术语。随着时代的发展，地域的变迁和文化学的日新月异，其含义也就较为纷繁，众说纷纭了。

据统计，如今世界上对文化的定义已经多达一万多种。目前使用较多的主要有四种：第一，知书识礼，指读书以及懂得道理的多少，如人事档案中的“文化水平”等，即同此类。第二，文化部门，如主管文学艺术、图书文博、群众游艺等工作的文化部、文化馆等。第三，观念形态的文化，指除了经济、政治以外的社会生活领域，如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所讲的“新民主主义的文化”，这是所谓狭义的文化。第四，人类创造的一切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这是广义的文化，如张岱年先生认为，“凡是超越本能的、人类有意识地作用于自然界和社会的一切活动及其结果都属于文化，或者说‘自然的人化’即是文化”。

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文化”一词的使用非常频繁。有时，“文化”是指与政治、经济、军事相并列的人类社会活动的某一门类；有时，“文化”又仅仅是衡量某人受教育程度、是否是文盲的评价尺度。在学者眼中，“文化”的定义简略但内涵饱满。梁启超说“文化者，人类心能所开积出来之有价值的共业也。”而梁漱溟认为，文化就是“生活的样法”。

文化的概念又是多层次的。一般来讲，人们对文化的理解有三个层次：第一层次的文化涵盖了人类所有的文明大文化观，如著名学者钱穆所指出的，“文化即是人类生活的大整体，汇集起人类生活之全体即是‘文化’”。第二个层次的文化主要指人类精神文化方面的创造性成果，而不包括物质生产及器物性、实体性成果，如英国

人类学家泰勒在其《原始文化》一书中所说的,“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性的民族意义来说,乃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习俗和任何人作为一名社会成员而获得的能力和习惯在内的复杂的整体”。第三个层次的文化概念缩小了文化的范围,它沿袭了传统和现实生活中人们对文化的直观理解,即将文化理解为以文学、艺术、音乐、戏剧为主的艺术文化,如国人所熟知的我国文化部门所管辖的文化范畴等。

2. 传统文化

一般认为,所谓传统,是“由历史沿传而来的思想、道德、风俗、艺术、制度等”。这实际上就是指传统文化(狭义的文化)。中国传统文化是指中华民族在进入现代社会以前的长期历史发展中形成传统的文化,对人们的思想行为起着规范作用的理念、价值和知识的体系。

所谓传统文化,是相对于现代文化而言的。“传统文化”是指文明史上和历史上存在过的、发生过的、被今天记忆的人类生存方式和生存乐趣以及在今天仍然被沿用或有所变异、有所发展的上述生存方式和生存乐趣。中国传统文化以封建文化为主体,其上限可以追溯到遥远的原始氏族公社时期,其下限一般划到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后,中国传统文化的统治地位也随之结束了。但传统文化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庞大精神实体,仍然顽强地延续着,并将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与现代文化相互并存、相互影响。

从地理空间范围讲,“中国传统文化”里的“中国”和“文化”不仅指今天国家地理版图的中国,也包括历史上的中国(版图有变化)以及受中国文化影响的其他地域和其他民族,而且还涉及中国出现之前的、中华民族形成之前的有关地域和民族的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内容主要包括:语言文字、文化典籍、科技工艺、文学艺术、哲学、历史、宗教、教育、道德伦理、节日习俗及建筑等多层面的内容。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共同组成我们今天的中华民族大文化。本书所说的文化指狭义的文化,即人类创造的精神成就的总和(包括全部精神产品以及物质产品中的精神成果的总和),其中包括哲学、宗教、道德、法律、科技、教育、语言、文学、美术、音乐、舞蹈、电影、戏剧以及风俗习惯等。

二、中国传统文化的生成及特征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条源远流长的大河,它产生于“人猿相揖别”的远古时代,经历了数千年的风风雨雨、坎坷曲折,穿越千沟万壑,汇聚了条条溪涧,终于形成了汹

涌澎湃、一泻千里的巨浪波涛。她从孕育起源到雄强博大,走过了一个漫长而曲折的发展历程,并逐步形成了自身显著的特征。

1. 中国传统文化的生成与发展

文化,如果从广义的概念理解,它的起源就是人类的起源,有了人类,就有了文化。全世界各地都流传着各种各样的神话传说,其共同特点就是上帝,或者是神创造了人,创造了世界,如中国的盘古开天辟地、女娲造人说,西方基督教世界信仰的上帝创造人。科学的人类学产生之后,人们现在大都承认,人类起源于一种古猿。而在人类的进化过程中,劳动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恩格斯在《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一文中,将人类的起源过程分为“攀树的猿→正在形成的人→完全形成的人”这样几个阶段,提出了著名的“劳动创造了人”的著名论断。中国的考古工作者经过长期的考古发掘,在中国境内先后发现北京猿人遗址和蓝田猿人遗址,后来又发现元谋猿人遗址、山西芮城县西侯度旧石器时代早期遗址、安徽繁昌猿人遗址等,这些都证明中国大地是人类的摇篮之一。其中,1961年到1962年间,在山西芮城县匭河村附近的西侯度发现一处旧石器时代早期遗址,经初步测定,距今至少已有180万年。1965年在云南元谋县发现的元谋人化石距今170万年。1998年,古人类学家在安徽省繁昌县孙村镇的考古发掘中,发现了距今200万年的古人类遗存。在繁昌县人字洞发现的骨制品和石制品,属于旧石器时代早期遗物,这是欧亚大陆最早的人类活动遗迹。在该遗址西北约200米处的山顶,考古学家发现了一处距今1000多万年的中新世裂隙堆积,其中埋藏有大量的古独牙齿化石。从体质人类学考察,从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的中国居民,基本上是在蒙古人种的主干水平下发生和发展的,构成中国原始先民的人种特征中没有发现西方人种的成分,中国人种是独立起源的。

中国地域辽阔,地理环境和自然条件复杂,产生在不同地域和条件下的中国文化一开始便呈现多元分布和多样统一性。黄河流域、长江流域、东北地区、华北地区、西北地区、青藏高原都有不同类型的旧石器和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的发现。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多达七八千处,证明中国文化是在不同地方多元发生而后逐渐融合形成的统一体。

中国境内发现的猿人化石,如元谋人、蓝田人、北京人、柳江人、山顶洞人等,存在着一些共同的体质特征,但至新石器时代,各地区居民的体质有明显的差异,而且从骨骼的异常变形还反映出各地存在着地区性的特殊风俗。根据考古发现、神话传说和民俗学的研究,中国上古文化分布很广,而华夏、东夷、苗蛮等可以称为中华民族远祖的三大文化部落。三大部落之间曾经发生长期的联合和不断的冲突,最后则

在冲突中走向融合。首先华夏族炎、黄两部落联合打败了东夷族蚩尤部落,完成了华夏与东夷族的融合;后来黄帝部落又击败炎帝部落,黄帝成为华夏部落的代表;华夏部落又征服了苗蛮部落,实现了华夏部落在中国的统一,从而确立了中华民族文化的主流地位。

文化有其自身的发展序列,这就是文化史。中国文化经历了原始文化、古代文化、近代文化、现代文化四个阶段。

原始文化 由于生产力极端低下,上古时期人们只能凭借感性的质朴的思维方式来把握自然界的某些表象,把自然力加以人格化和形象化。因此,原始宗教和上古神话成为这一时期精神文化的主要产品。这是中国文化的萌芽期。

古代文化 古代文化包括奴隶制文化和中世纪文化。这与西方的情形有些不同,在欧洲历史上,奴隶制和中世纪是界限分明的两个社会发展阶段,所以有古代文化(即奴隶制文化)和中世纪文化之分。在奴隶制时代所创造的物质文明的基础上,精神文化得到多方面的发展。埃及、巴比伦、印度、印第安都产生过高度发达的古代精神文明,而希腊、罗马更创造了古代文化的高峰。中世纪文化即封建文化。“中世纪”在欧洲指自476年西罗马灭亡至1640年英国大革命时期。中国的奴隶制文化和封建制文化没有像欧洲泾渭分明,而是一脉相通,所以学术界习惯于把中国的奴隶制文化和封建制文化一并称作“古代文化”。奴隶制文化(夏商周时期)为中国文化的雏形期,封建文化(秦汉至鸦片战争)是中国文化的发展期。

近代文化 欧洲近代史是从17世纪40年代算起,至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中国近代史则从1840年鸦片战争至1919年新文化运动。与欧洲资本主义文化不同,中国近代文化是半封建半殖民地文化,这是中国文化的转型期,是中国古代文化从辉煌到停滞,在西学冲击下开始发生嬗变的特殊时代。

现代文化 欧洲现代文化是从第一次世界大战至今,中国现代文化是从1919年新文化运动至今。在中国,这一个时期重要的文化现象是传来了马克思主义,是资本主义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并存时期。中国曾一度认为从俄国人那里学到了马克思主义,从此找到了正确的发展道路,中国文化因此获得了新生。但是,在向前苏联学习了很多年后,我们在实践中发现了许多问题,所以,现在仍在讨论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问题,对马克思主义仍然存在继续学习和不断探索的必要性。

中国传统文化主要指中国古代文化。这一时期,中国文化大体经历了奴隶制时代和封建制时代。根据学术界对中国文化史的普遍分期,可以大致划分为五个段落。

夏、商、西周和春秋战国时期:中国文明奠基和元典创制期。公元前两千年左右,文字、青铜器、宫殿、祭坛等的出现,揭开了童年时期中国早期文明的面纱;天地人三大祭祀,孕育了中国文化一系列特征;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前3世纪形成的

《诗》《书》《礼》《易》《春秋》及《论语》《墨子》《老子》《庄子》《孟子》《韩非子》等中华元典,系统地展现了中华文化的中坚理念,营造了中国人的精神家园。

秦汉时期:一统文化探索、定格期。中国文化的很多基本面貌都在秦汉时期固定下来;在经过秦朝至汉朝前期百余年的探索、调适与磨合之后,大一统帝国的集权制终于找到了一种与之相契合的意识形态,即发端于元典时代而又吸纳了道、法、阴阳诸家的儒家文化;中国古代皇权更替、朝代循环的基本模式,在这一阶段形成并固定下来;中国文化由多元走向一统,中原农耕文明在与周边游牧文明的冲突交融中,逐渐赢得强有力的控制地位。

魏晋南北朝至唐中叶:胡汉、中印文化融合期。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冲突整合是六百年间中国文化的一大主题。北方游牧民族、西域商业民族大量迁入中原地区,造成胡汉文化的交流和融合;印度佛教文化东传,与中国传统文化冲突、碰撞,互相吸收,造成儒释道的吸收与交融。在这一时期,佛教中国化,并最终融入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随着经济重心的转移,文化中心也开始发生向东南的转移。

唐中叶至明中叶:近古文化定型期。唐代中叶以后,领主庄园经济破产,地主—自耕农经济定型;赋税制度以两税法代替租庸调制以及宋明几代赋税制度的改革,越来越明确地把封建政府与平民的直接经济关系确定下来;由于科举制度的实行,官吏直接通过考试选拔,造成复合型官僚和士大夫政治的出现。城市经济日益发展,工商业繁荣,市民阶层兴起,市井文化趋于活跃;酝酿于唐中叶,在宋明两代得到发扬光大的“理学”成为封建社会后期官方意识形态;文人、官僚、地主或商贾合为一体,形成所谓士大夫阶层,其审美情趣、人格理想、道德观念主导了全社会的价值规范,影响深远。

明代后期至鸦片战争:中西文化交汇及文化转型期。随着欧洲人环球航行的成功,西方传教士来华活动揭开了中外文化交流史上新的一页,开始了西学东渐和汉学西传的新局面。这是继佛教东传以后,中国本土文化与域外文化的又一次大交汇。中国传统文化遇到西方现代文明的挑战。商品经济的发展,市民阶层的兴起,导致意识形态领域许多新思想新观念的产生;明朝的覆亡和满人入关,给中国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心灵上极大的震撼,明清之际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开启近代启蒙主义之先河。这些都预示着中国传统文化进入一个深刻变革时期。至鸦片战争发生,西方列强用炮舰和商品打开中国封闭的大门,中国文化便进入与西方文化冲突、调适、融合、变革的艰难过程,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现代转型的起点。

2. 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特征

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质决定着它所表现出来的种种特征。由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源远流长,内容博大精深,因而在表现形式上就不可能是单一的,而是丰富多彩,有着众多层次和方面的一个系统结构。概括起来讲,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特征有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以德性修养为安身立命之本。在中国传统的安身立命观念中,最注重的是个人的自我德性修养,而这其中又以儒家的自我修养理论影响最为深远。在孔子看来,要变“天下无道”为“天下有道”,志士仁人在德行修养方面就要达到“仁、智、勇”的“三达德”境界。一旦一个人达到了这一德性修养境界,就能做到“知(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孔子·子罕》)。

到了宋代,朱熹发挥了“居敬察省”的德性修养理论。所谓居敬,就是意念之间存在一个郑重而不苟且的态度,对人、对事、对学问、对根本的义理,都郑重其事。所谓察省,就是做到时时反省检查自己。正是鉴于德性修养对于一个人安身立命的重要性,他把《礼记》中的一篇《大学》单独拿出来,列为“四书”之首,而《大学》之所以被看重,其原因就在于它强调了自我修身的八个步骤,并以天下太平、和谐为终极目标。这一修身功夫最初的两个步骤是诚意、正心,即立志;其次两个步骤是格物、致知,其目的在于了解世界;接下来的一个步骤是前面四个步骤的总结概括,即修身,其目的在于使自己变得完美,以便使自己能够担负起社会历史责任;最后三个步骤是齐家、治国、平天下,其目的是实践自己的德行,在治国安邦的社会活动中实现一个人的生命价值。在古代,《大学》是每一个读书人接触的第一本经典,具有启蒙和确定人生宗旨的作用。可以说,后来整个中国文化关于修身方面的论述都是以它为主导的。

中国传统修身理论讲诚意、正心、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中心环节是修身。因为诚意、正心、格物、致知是功夫,目的是为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修身的必然结果,身修好了,那就会家齐、国治、天下太平。所以说,修身是立身之道,也是立国之道。传统文化中的德行修养理论,强调了个人道德修养对社会的重要作用,这显然是非常合理的。这一德行修养的传统积极结果就是在历史上塑造了无数个范仲淹那样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志士仁人,他们身上所体现的崇高德行已成为我们民族的道德理想追求。

第二,以中庸为基本处世之道。中庸之道作为儒家最推崇的为人处世之道,一直贯穿于整个中国古代的传统观念之中。按照孔子及其以后儒家的解释,“中庸”的“中”,有中正、中和、不偏不倚等含义;“庸”即“用”的意识。“中庸”即“中用”之意。

所以,“中庸”意即把两个极端统一起来,采取适度的中间立场,既不能过,也不能不及。从历史上来看,中正平和思想在孔子之前就有人提倡。尧在让位于舜时就强调治理社会要公正、执中。《周易》中也体现了“尚中”的观点,所以,它的中爻的爻辞大多是吉利的,也就是说,只要不走极端是不会出现不利局面的。春秋时期,中正平和思想进一步扩展到其他领域,如晏子就认为,食物、色彩、声音等,以能使人们心平德和为善。

孔子及以后的儒者,则在上述基础上,对中庸思想作了广泛的发挥:在政治上,依靠中庸之道的原则,既不能一味宽容、宽厚,采取无为的态度,也不能使政策过于刚猛,刑罚过于苛重,二者要互相协调、互相补充,以中和的态度处理政治问题。在经济上,依照中庸之道的原则,要给予百姓实惠,但不能浪费;要使百姓勤于劳作,但不能过度压榨,使他们产生怨恨;要允许各种欲望得到满足,但不能鼓励贪婪,没有限度。在伦理道德上,中庸更是被视为最高的道德原则。只有遵循中庸原则的人,才能成为君子;行为过激的人,只能被看做小人。孔子就曾批评他的两个学生说,子张放肆过了头,子夏则过于拘谨,他们都没有做到中庸。在日常行为方面,以中庸之道来看,做事只考虑实际的质朴以致忽视了文采,就会显得粗野;而只考虑外表的文采以致忽视了质朴,则又会显得虚浮。在处世态度方面,主观武断而不留余地,自我为中心,固执己见,都不符合中庸之道。在审美欣赏方面,依照中庸之道,可以追求美的享受,但不能沉溺其中;可以有各种忧思悲哀,但要适度,不能伤害身体;如此等等。

中庸之道还被后世儒家进一步概括为世界的普遍规律,它不但体现了事物发展运行的规律,也成了人们实践所必须遵循的普遍原则。所以,中庸之道成为社会教化的重要内容,被视为是做人所必须达到的一种境界。《礼记·中庸》把这种境界称为“极高明而道中庸”。至于如何达到这一境界,《中庸》认为有五个步骤“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这一思想对我国古代知识分子安身立命与为人处世的实践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

作为一种根本的处世之道,中庸之道使人们普遍认识到自己的行为态度要适度,从而避免过激行为的出现,这使得中国社会有了某种特殊的稳定性,这是它积极的一面。但另一方面,它也为折中主义、明哲保身的处世哲学提供了理论土壤,这又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社会的向前发展。

第三,以耕读传家为根本的治家之道。在古代中国家国同构的社会结构下,治家之道历来被看得很重。这其中,“耕读传家”被视为最基本的治家之道。“耕”是指农耕,“读”则是指读书。这一注重耕读的传统观念是与我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相适应的。

我国古代社会的基本结构是以农养天下,以士治天下。这也就是说,养天下必须重农耕,治天下必须重读书。我们知道,农业是中国古代社会的根基,历代统治者均有深刻的认识,故而总把“重农”作为安邦兴国的基本精神。《吕氏春秋》一书中讲“霸王有不先耕而成霸王者,古今无有。”所以,春秋战国以来,“重农”已成为君主既定的兴国之策。另一方面,古代统治者也看到了读书人在治国安邦中的重要作用,于是采取各种方式把读书人中的佼佼者吸收到统治阶层中来,置其于官位,供之以俸禄,使读书人为其所用。统治者的这种重农耕、尚读书的长久治国策略影响到民间社会,就形成了中国家庭“耕读传家”的基本观念。

其实,中国自古就有尚农的传统,把农桑视作生存之根本。《周易》讲“不耕获,未富也。”从秦朝开始,历代统治者的重农抑商政策,更是把人们牢固地牵制在土地上,天下百姓莫不以农耕作为根本的生活手段。长期的经验积淀使得古代中国人树立了一个牢固的信念:农耕是最可靠的、最为稳定的生存手段,除非万不得已是不能放弃的。正是在这样一种观念的影响下,在我国古代,即使是通过工商业致富或为官发财的人,最终也以购买田产作为根本生存与发展之计。因为,相比而言,这乃是最稳定的保存家产的办法。

虽然农耕是生存的基础,而若要求发展、求成就、求财富,在中国古代社会,唯一的正道就是读书。因为“学而优则仕”,读书人可以通过读书入仕谋生,乃至发财致富,光宗耀祖。所以,孟子就说过“士之仕也,犹农之耕也”。这句话的意思是说,读书人做官就像农夫耕地一样可以安身立命。

可见,“耕读传家”这一观念既有重生计之“俗”,又有求高洁之“雅”,实在是我国古代传统文化中融雅俗于一体的生存智慧。它是古人在重农尚仕的社会之中所能采用的最好治家方式。因此,“耕读传家”作为根本的治家观念深植于传统文化之中,几千年来一直为世人所接受并传承。

第四,以经学为治学之根本。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经学成为一以贯之的学术之根本。“经”本来是孔子所整理的上古文化典籍,总称为“六经”,即《周易》《尚书》《诗经》《礼》《乐》《春秋》。它包括了古代的政治、历史、哲学、文学、音乐、典章制度等丰富的文化内容。孔子去世后,儒家分为很多流派,但这些不同派别的思想家对“六经”均非常重视。荀子在《劝学》篇中就认为,做学问“始乎诵经,终乎读礼”。也许正因为这一缘故,荀子被认为是经学最初倡导者。到了汉代,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才使“经”的地位也因此而大大提高。研究“六经”及儒家经典的学问被称为“经学”,是当时学术文化领域中压倒一切的学问。与此同时,“经”也在不断扩充与增加,到宋朝时已扩充为“十三经”,《论语》《孟子》以及阅读古代经书的语言文字工具书《尔雅》等也都包括在了其中,成为一切文化学术的

根本。

正因为如此,在我国古代,“经”具有不可更改和不容怀疑的权威性。西汉王朝推行“以经取士”的选官制度,更是引导读书人只从“经”处做学问。此后,传授经典和注解经典都成为专门的学问,并逐步形成了自汉代至清代的官方哲学——“经学”。

作为一切文化学术的指导性经典,这些“经”常常被刻在石碑上,以显示其权威性。据史籍记载,在中国历史上,就曾有过七次大规模的刻经。如今,在西安碑林博物馆内,还完整地保存着唐代的“开成石经”。除刻经外,历代对“十三经”的注疏、训解、发挥,更是层出不穷。仅据清代乾隆年间的《四库全书总目》记载,“经部”的著作就有1773部,20427卷。可以说,在汉代以后,经学的发展取得了驾驭和主导一切学术文化领域的至高无上的地位。

其实,经学是一门内容涉及广泛的学科,仅就“六经”而言,就已经包含了人文科学及某些自然科学。孔子就说过,读《诗经》,甚至可以增加对鸟兽虫鱼草木之名的博物知识。因此,经学本身并不排斥自然科学,相反,儒家经学中的理性主义以及某些思辨方法,对自然科学甚至还有启迪的意义。但问题的关键是,经学以它自成一体的体系,凌驾于一切知识之上,无形中就排斥了科学的独立性,对古代中国的自然科学发展显然是不利的,其至少是明朝以后中国科学技术落后的一个重要文化根源。

第五,以义利合一为基本价值追求。追求义利合一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基本的价值思想,它是在古代思想家们漫长的义利之辨的争论中逐步形成的。这里所说的“义”是指道义,而“利”则是指利益,一般多指物质利益。

从先秦开始,中国古代思想家们就纷纷对义与利的关系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主张重义轻利,如孔子就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孔子虽然没有否定“利”,但他反对见利忘义,主张君子要“义以为上”“见利思义”。孟子继承了孔子的思想,但更强调义与利的对峙。他说“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孟子·梁惠王上》),并以“为利”还是“为义”作为区别小人与君子的唯一价值标准。荀子则认为,任何人不可能不考虑个人利益,然而应使个人利益的考虑服从道义原则的指导。用他的话来说就是“义与利者,人之所两有也”。荀子就认为虽尧舜不能排除民之欲利,虽桀纣不能去民之好义。所以,荀子认为处理好义利关系的基本原则是“见利思义”。这与孔子的思想也基本是一致的,只不过他更承认人有好利之心这一基本事实。到了汉代,董仲舒提出了“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著名命题,以尚义反利的观点片面发展了先秦儒家的重义轻利的价值观。所以,后来清初的启蒙思想家颜元针锋相对地提出“正其谊以谋其利,明其道而计其功”的相反命题。他认为,“义中之利,君子所贵也”,把义与利相互结合了起来。颜元在古代思

想史上第一次对董仲舒以来的道义论价值观作了可贵的纠正。

当然,在义利统一问题上,中国传统文化由于正统儒家思想一直占主导地位,所以重义轻利,甚至是尚义反利的思想也一直是一个传统。这一传统一方面维持了中国古代社会的稳定和延续,塑造了中国人以道德为上,重气节、重人格的民族性格;另一方面,也有压抑人的物质欲望,扭曲人性的弊端。对于中国传统价值观中的这一片面反“利”传统,无疑也是我们今天所应该批判和否定的。

第六,以直观意象为基本的思维方式。与西方传统文化中比较强调逻辑推理的思维方式不同,中国传统文化在思维方式上以直观意象为主。这是一种通过直观、直觉来直接体悟和把握对象的一种思维方式。这种思维首先是直观和直觉的,儒、道、佛三家的认识论都带有这一思维特点,最典型的表现就是充分体现儒、道、佛三家合一的理学思维。宋明理学家将“太极”“天理”作为包容了宇宙人生一切真理的本体存在。但对这个本体的认识,他们认为只有通过直觉顿悟才能实现。只不过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派强调“格物致知”“即物穷理”,把经验和积累作为顿悟的必要条件,最后通过顿悟而“豁然贯通”,由渐而悟,完成心理合一、天人合一的整体认识。而以陆九渊、王阳明为代表的心学派则主张当下参悟,明心见性,“立其大著”“点铁成金”。张岱年先生曾指出“中国哲学只注重生活上的实证,或内心之神秘的冥证,而不注重逻辑的论证。体验久之,忽而有悟,以前许多疑难豁然消释,日常的经验乃得到贯通,如此即是有所得。中国思想家的习惯,即直截将此悟所得写出,而不是更仔细地证明之。”由此可见,与讲究分析、注重普遍、偏于抽象的西方传统思维方式不同,中国的直觉思维更着重于从特殊、具体的直观领域去把握真理,它超越概念、逻辑,是一种创造性思维,显示出中国人在思维过程中的活泼不滞、长于悟性的高度智慧。

中国传统文化中所体现的思维方式又是意象的。这种意象性源于直观直觉又超出直观直觉。在《周易》里,我们就可以看到这种极具中国特色的思维模式。《周易》中由阴阳、八卦、六十四卦和三百六十四爻组成的卦象,就充分显示着意象性思维,它由象数符号表现整体意义。中国传统的文学艺术则更注重意和象的浑融一体,强调只有发现和形成了意象之后的创作,才能进入到独特的境地。所以,中国艺术就是在营造意象的艺术,如中国画就强调“意在笔先,画尽意在”。所以,中国画中所描绘的,与其说是客观对象,不如说是主观的意义和象征。中国书法艺术更是意象艺术,书法美是意象美。所谓书为心画,是意味的形式与象征。同样,中国古代的诗歌不同于西方偏于表现情节,而是借象寓意,借景抒情、情景交融,追求意和象,意和境的极致。“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从中国最古老的诗歌总集《诗经》就开始对意象的追求与营造,显示出中国传统文学所特有的韵致和